

聆 教

于 友

5月21日下午2时，我按照预先约定的时间去访问陈翰笙教授。多年来他一直住在东华门一条胡同破旧的四合院里，搬进木樨地的“高干楼”还是不久以前的事。他的新居我是第一次来。

开门的就是陈翰老，他早已在等候我了。

“翰老，你休息好了吗？”我问。

“休息好了。中午我照例休息一小时。”

翰老引我到他那间办公的书房。这里的陈设非常简朴，连一只沙发也没有。房间两边都是书柜。房间中间放置着一张古老的中式书桌。我在书桌一边的硬木椅子上坐下来，就看到对面书柜玻璃门上贴着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办公时间表：“上午8:30至11:30，下午1:30至4:30。”

翰老虽然年已91，还担任着世界史所的名誉所长。他实际上并不负担什么具体工作，但是，看来他还保持着按工作日生活的习惯。

来访之前，我就知道他很忙。这几年他没少参加社会活动，写了不少文章，在家里还教着一批青年学英语，他同意我来求教是通过电话商定的，正好这天下午他没有别的安排。

“书本带来了吗？”他在我对面一坐下来就问我。

“带来了。”我从手提包里取出了一本英文书《华盛顿——丑闻之城》。

翰老是抗战时期我们国际新闻社的负责人之一，是我们通讯社在香港出版的英文通讯《远东公报》的主编。这回，我在休息时间译完了上面说的那本书，有一些美国的新词和习惯语吃不准，我来向翰老请教。

我早已把书上18处疑问抄了表，注明了原书的页码。我开始提出疑问，把书递给他。

“我看不见，请你念出来。把有关的句子一起念。”他说。

我这才记起了翰老视力不佳。他患白内障和青光眼，有时还自我嘲弄说：“我可是一清二白的，”说的就是他患了双重的眼病。

他的英语听力很强，对我18个疑问逐一作了解答。绝大部分我可以写出读者能理解的汉语了。个别的词实在太新，翰老也陌生，他从书柜里找出他的字典，要我查看适当的解释，由他来捉摸。

他有时还问我：“我看这样解释行，你说呢？”

“翰老，行。”我没有什么异议。

谈完了18个疑问，已将近两小时，可是他还不准备结束。他把我一周前约请他写纪念胡愈之文章的信从抽屉里取出来，他说：“纪念胡愈老的文章应该写，他是很值得怀念的人。他待人宽，责己严。他生前一直在默默地工作。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取来一张纸，那是一张一面已经印着油印材料的纸，他要我在白的一面作记录，说，“我说，你记。请你尽早设法写成文章。”

“好。”我表示愿意遵命照办，我很想听听翰老心目中的胡愈老究竟是怎样一个高大的形象。

他又花了整整一个小时，告诉我他同胡愈老的往来。我在他给我的纸上扼要地记录着，写下了不少他的原话：

“早在胡愈老编《东方杂志》时，我就向他投过稿……”

“1941年胡老到香港，专门为国新社办英文通讯稿来找我，他认

为我熟悉外事,有不少新闻界的外国朋友,要我主编,他对我很信任,安排了一个办事员给我做帮手。办事员只管印刷和邮寄……”

“解放后,我们开始一起在北京共事,主要是搞人民外交活动,我们都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领导成员,后来曾先后担任亚非学会的会长……”

“抗战时期,我搞过‘工合’运动,胡老对‘工合’也很热心,他认为这一种劳动者共同生产的组织,解放后也可以试搞,在政协里他提过建议……”

“我们都关心面向海外的新闻报道,担任了中国新闻社的理事,一起开过理事会,给中新社当过参谋……”

翰老在回忆这些事例时都重复说:“胡老一心为公,不谋私利。”还说:“你写稿时,一定要突出胡老这个重要的特点。他是鲁迅的学生,也是鲁迅提倡的孺子牛。很可惜,他先我去世了……”

我看了一下手表,时针已指在5点上。翰老谈兴还浓,他怀念志同道合的老战友动了感情。可是我觉得实在不能太劳累老教授了。我站起来向他表示感谢,道了别。

这天晚上,我把译稿上遗留的地方一个个补译好,然后还把陈翰老所谈胡愈之的往事写成了2000多字的草稿。这天晚间我压根儿没看电视,也没有早睡觉,因为陈翰老下午同我谈话,给了我很多启示,其中之一就是老当益壮。

载于《群言》
杂志